

关于邺城古址之讨论

——答邹逸麟同志

张之

《殷都学刊》1995 年第 2 期登载邹逸麟同志《春秋秦汉邺城古址考辨》一文，对拙作《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城处》（《历史地理》第九辑，1990 年），及《邺下古渠考》之第一部分（《中原文物》1994 年第 1 期）提出不同意见。逸麟同志赐函云：“如您有不同意见，亦望能一齐发表，这样可把问题理得更清楚些。”今

遵嘱回答于下。

先回答有关邺之地望方面的问题。

（甲）、我以为邺之初筑不在古邺城处，所据有三：一是汉朝魏郡城之地望；二是战国时平阳城之地望；三是近代考古发掘之所见。邹文着重对魏郡城之地望提出不同意见。拙文引用六条文献论证魏郡城不在古邺城处，而在今安阳近处。邹文以为唯有《旧唐志》一条为硬证据，却又属错误。邹文引《元和志》载汉之魏郡治古邺城，从而提出如果不在古邺城，则“《元和志》乃宰相李吉甫主持的官修全国总志，怎可能有这样大的错误呢？”《元和志》确是一部有用的地理书，然也有疏漏与问题。即以所讨论之汉朝魏郡治所而言，《元和志》一方面在“相州邺县”条载为治于古邺城，如邹文所引；另一方面，又在“魏州”条载为：

汉高祖使韩信定河北，以秦邯郸郡之南部，并东郡之边县，置魏郡，即今元城县是也。

究竟汉之魏郡，治古邺城？治元城？李吉甫本人就自相抵牾，如何能据其自相抵牾之言，否定《旧唐志》？顾祖禹在《方輿纪要·序》中，指出：“《元和志》无乃太疏。”“太疏”云云，对官居宰相的李吉甫，够客气了。

邹文又以《元和志》成书于公元 813 年，比成书于公元 945 年之《旧唐志》早 132 年，说明《元和志》较《旧唐志》为可靠。众所周知，《旧唐志》成书虽晚，所用资料，却来自天宝年间，较使用元和年间资料之《元和志》早了许多。敝意以为，不必以二书成书之早晚来定取舍。

邹文还提出：“《水经注》怎能在《洹水注》中，只字未提这个从春秋到秦汉历经数百年的古城呢？”以说明《旧唐志》所载之魏郡城不可靠。酈注无明确记载，确是应该考虑。不过，也并非只字未提。《水经注·洹水注》载：

（洹水）东迳殷墟北，……洹水自邺，东迳安阳县故城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邺城南四十

里有安阳城，城北有洹水东流者也。又东，至长乐县。

酈注中之安阳县故城及所引《魏土地记》中之安阳城，皆为唐宋之相州外城，位今安阳北关南部。“自邺”与“东迳”，二语，应留意。“自邺”之“邺”，位殷墟（古籍所载之殷墟，甚广，不仅指今之小屯村）近处，“安阳县故城”之西。正与《旧唐志》位于安阳西北七里之魏郡城合。不指古邺城。古邺城位于“安阳县故城”之北，偏东，与“东迳”一语不合。

邹文又引《刺客列传》，指出该传有关处，书“漳邺”而不书“洹邺”，可见“古邺不在安阳”。漳洹二水分流魏郡城之北、之南处，相距约 15 公里，魏郡城去洹水近而去漳水远。漳水较洹水源远流长，水势也大。一般说，取其近者，连书为“洹、邺”，可；取其大者，连书为“漳、邺”（从中华书局本标点，下同），也可。《刺客列传》云：“（秦）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，王翦将数十万之众，距漳、邺。”邺，原属魏，北与赵为邻。后，魏赠邺与赵，又为秦夺。此时，秦兵“北临赵”，正应屯兵于邺北之漳水边，对赵形成大军压境之形势，“漳、邺”云云，极为恰切。如作“洹、邺”，反不见当时形势。故敝意以为荆柯传“漳、邺”一语，不足以作为否定《旧唐志》之资料。

邹文又指出：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邺县条所载地名，“均在古邺城一带，而不在安阳附近”。而《郡国志》采用东汉永和五年（公元 140 年）版籍，早于汉末许多年，“此为古邺不在安阳之证二”。

汉，邺县地虽大，而属今安阳者，仅其西南部。这部分地区中，一些著名之地名或古迹，如西门豹祠、野马冈、韩陵山以及与曹操、高欢、高隆之、李景等人有涉之地名、古迹，在东汉永和五年（公元 140 年）都尚未知名，或尚未出现。个别已出现者，又有争议，其实不在此地区，如邯鄲。所以《郡国志》所载邺县地名，虽不是“均在古邺城一带”，却确实偏北，不在今安阳境内。这一事实可以说明，在

当时，无论郡治、县治，在其各自境内，都不居中。（此与战国邺县境不同。彼时，邺县往南至少包有今汤阴县）所以，东汉元初五年（公元 418 年）前，郡治、县治有一已迁于古邺城处。至东汉末年，始全迁至古邺城。原址已不适中，也徙治之一因。至于《郡国志》采用永和五年（140 年）之版籍，那已在元初五年（118 年）之后，更不足以证明古邺不在魏郡城处。

总之，邹文虽从以上四方面驳《旧唐志》，就其所运用之资料观之，尚不能认为《旧唐志》所载为“错误”。

拙文所引用之古籍，除上述《旧唐志》外，邹文以为《通典》、《寰宇记》两条所载之魏郡城，仍然指的是位于今安阳东北的古邺城，因而这两条不能说明问题。这里逸麟同志偶尔粗心了，这两条不指古邺城是很明显的，无用辩说。

邹文以为《邺乘》多有讹脱，不足为据。《邺乘》此条全文是：

韩郡城即汉以来韩郡治所，在县东北十里，俗名七里冈。

汉朝今安阳一带，从无韩郡之名，只有魏郡，韩为魏之讹，一眼便可看出，书之著者崔铣，乃明朝知名学人，其书“参诸史”。韩郡、韩郡城云云，决非原稿之误。不应因此条有此极明显之讹字而排除之。

邹文以为《通鉴》胡注、《方輿纪要》所载之魏郡城，“显然是抄袭《旧唐志》的，不能作为补充证据”。胡注文字与《旧唐志》文字极近，《纪要》则明标“刘煦曰”，确是容易令人怀疑或误解“抄袭”《旧唐志》。然而在“胡注”之前，《通典》、《元和志》都与《旧唐志》不尽同或不同，胡氏为何单要“抄袭”《旧唐志》呢？以胡氏之才学识见看，绝不会没有见过《通典》与《元和志》。再者《旧唐志》取材于天宝年间之资料，胡氏就不能取材于天宝或天宝以前之资料吗？如果对某些杂凑之书，指其为抄袭，尚无大不可，对胡氏便未必妥当。“胡注”

对魏郡城之记载,可表明《旧唐志》所载,并非孤证。邹文在驳《旧唐志》时,提出“怎么从《水经》、《水经注》以下,历代地理书(《旧唐书》除外)都没有提到这个古城呢”,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当,是不是轻率地将“胡注”及《通典》、《邺乘》一概排除在历代地理书之外的缘故呢。敝意以为讨论魏郡城是否存在,无论《通典》、《旧唐志》、“胡注”以及《邺乘》等,都应认真对待。

(乙)、关于拙文之佐证资料

拙文除从三方面列出依据外,还提出佐证资料二。

(一)、清·吕吴调阳《汉书地理志详释》中两条。其一条,邹文已转引,即“邺,本在安阳,以隆虎之水得名,曹操始徙邯沟,仍名曰邺”。其二条,邹文未引,好在不长,再录于下:

隆虑,今林县。本作隆虎,邺水(此下疑脱“所出”二字),象钟虎之高隆也。伪作“虑”,颜氏音“庐”,可谓自圣,不师古也。

此两条文字比较艰深,如:隆虎为何是象钟虎之高隆?隆虎之水为何与邺有关?隆虑山名为何不称?等,都应有所说明。因此,拙文对之曾作笺释,引《诗经》及“朱注”,并隆虑山貌,笺《详释》之语。拙文一再明确指出:《详释》与拙文“所据不同,然也有其道理”,“《详释》也自有据,非徒立异”。“吕氏所释,应是”。“则不知其所据”。笔者作笺之意十分明显。对此,邹文未指出拙文所笺,有何不当,而指为“转弯抹角式的考证”,笔者不禁感叹:对佐证资料作出笺释,便是转弯抹角式的考证。那么,不计笺释之处,仅留所引原文“邺,本在安阳”,也可以作为佐证资料吧。

邹文又云:“实际上,吕说是先有了邺在安阳的看法后,硬凑出来的论据,完全不可信从”。笔者自惭,无能力从上列引文中,看出吕说是先有了看法,后凑出的论据。可惜邹文也未说明。

(二)关于梁期城地望两说,拙文以为两

说皆不误,“古邺城西四十里”与“魏郡城北五十里”正是同一地区,对此,邹文以为魏郡城北五十里,在磁县之南,漳河以北一带;古邺城西四十里,在磁县西南岳城水库一带,“根本不在同一地区”。古籍中表示方向之语,多有:南,实际上指东南或西南者;北,实际上指东北或西北者。此梁期城位于魏郡城北偏西,位于古邺城之西偏北,拙文附图中已画出,可复按。

此外,因酈注之梁期城依“邺北五十里”之说,却自古邺城计程,与拙见不同,所以拙图中另画有酈注之梁期城,并在其旁批有“水经注”字样,以作区别,表明拙见不概括酈注,而文字上未加说明。邹文指此为“无法自圆其说”,这个证据不能成立”。这意见提得好。虽是佐证,也应对概括不了之处作出说明,不可仅在图上标出。

酈注虽承《风俗记》“邺北五十里之说,却是自古邺城计程,以为梁期城在古邺城之北五十里,并明确指出,邺西之“世谓之梁期城”为不合。对此,笔者颇有所疑。“世谓”云云,非一人之言也,“世谓”为何不合,酈注未言。究竟“世谓”合,抑是酈注合,值得考虑。拙文提到《十三州志》也言在邺北五十里时,也未作文字说明。今按:《十三州志》不自古邺城计程,《志》云:

三户,邺北五十里,梁淇故县。

此言“三户”乃“梁淇故县”地,也在邺北五十里也。三户地望明确,在古邺城之西(见《史记集解》引孟康曰“津峡名也,在邺西三十里”)。因此,梁期城自然也在古邺城之西了。可见《十三州志》梁淇在“邺北五十里”者,明显不自古邺城计程。此笔者对酈注有疑之二。《方輿纪要》磁州梁期城条云:

在州西南,汉县,属魏郡。《风俗记》:“邺北五十里有梁期城”。

此与酈注同引《风俗记》,然依酈注,则梁期城应位于磁州之东北(磁州位古邺城北偏西约二十里);依《纪要》,则位磁州之西南。

《纪要》与酈注时之“世谓”合，与《索隐》“邺西四十里合；《纪要》引“邺北五十里”之说，而以磁州西南当之，与《十三州志》以三户当之者，同，显然不自古邺城计程，而与拙见合。此乃笔者对酈注有疑之三。综合观之：酈注与其前之《十三州志》、其后之《索隐》、《纪要》，均不合，故疑之而不取。——此意，如详述，则过于枝蔓，便仅在附图上标明。如此处理，确不妥当，今藉回答邹文机会，补述于此。

至于邹文提到《水经注疏》以《索隐》为误，以证梁期城不在古邺城西。笔者按：《水经注疏》此处所论，不稳，尚不足为据。兹引“疏”文于下：

《索隐》谓在邺西四十里，与《十三州志》在邺北五十里显然不合，据孟康云，三户在邺西三十里，张晏云，三户在梁期西南。唯梁期城在邺北五十里，可言三户在梁期西南。若是梁期在邺西四十里，则反出三户之西十里，何得仍云在三户西南乎。则梁期当以应劭、阚咽邺北之说为是。

此节疏文与酈注之意同，唯其着眼处在三户、梁期之里程。如以疏文所述之里程看，“邺西”之说是有问题。然而二者之里程均有异文。依“异文”而言，适相反。异文是：1. 酈注引孟康云，三户在邺西四十里，而非三十里；2. 《索隐》引孟康云，梁期在邺西三十里，而非四十里。可见疏文所论，不稳。不足为据。

然后回答有关西门渠之问题

先说几句题外话。讨论关于邺古址之拙文，并非必须讨论关于西门渠之拙文。邹文强将两篇拙文拉在一起。而且一再认定“渠文”为“邺文”服务。不知是拙文中有所表达，还是逸麟同志的设想？再者，“渠文”早于“邺文”六七年，本文之“注”可供参考。虽然如此，邹文已将“渠文”拉入，笔者自然也应作出回答，可惜，对讨论邺之古址无关。

首先，论西门渠之拙文，述评先秦西汉三种说法，以褚少孙所补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所

载，西门豹引河水之说为是；此说与《吕氏春秋》所载，史起指责西门豹“不知引漳”之说，不抵牾，且相发明；而《河渠书》所载，西门豹引漳水溉田之说，非是。拙文否定“引漳”说，分别以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滑稽列传》对西门豹引漳一事所持之态度作为依据。拙文肯定“引河”说，以褚先生之语有据，也有可能，且与《吕氏春秋》之说，互相发明，作为依据。邹文介绍拙文的根据时，改为有二：（一）“河伯”指的是河神，不是漳水（神）；（二）西门豹引的是河水，不是漳水。邹文如此为拙文提出根据，令笔者不胜惊讶，其（二），乃拙文之结论，何尝是论据。其（一），乃针对贵泰指褚先生“引河”说之“河”即漳水，而举例说豹传之“河”不指漳水，之一例，又何尝是拙文“两个”根据之一的论据。反过来，拙文之真正论据，邹文却全部不提。如果邹文属实，则拙文简直不成其为文字。作为学术讨论，邹文不应如此。拙文具在，可以复按。

其次，邹文否定“引河”说，举贾让治河三策中主张在黄河两岸开水门而实做不到，以证明西门豹当年未曾在黄河开水门。关于当年黄河水道中水，西门豹没有条件引用这点，拙文已明确指出，无用回答。

其三，针对拙文论西门豹所引之河水，乃黄泽中之大河故道余水，或大河溢出之水，邹文引用了《水经注》、《郡国志》、《水经》等，指出：黄泽在内黄县，而内黄县故址当在今内黄之旧县村、大固县村。黄泽距安阳市西北7里处，大约有30余公里，开渠恐怕是不可能的。黄泽确在汉之内黄县。汉内黄县治位今汤阴故城村。今内黄之“旧县村”乃唐内黄县治，“大固县村”更晚，为金朝迁县治于今内黄村，中间暂栖之地。黄泽位今汤阴故城村西北，与今之广润陂洼地相叠压。黄泽周围数十里，其西岸，去今安阳市西北7里处，不过30多里（约18公里）。拙文附图所画之西门渠灌区，位黄泽之西，近处，并不到安阳市西北7里处。邹文对当地地理，对拙文、拙

图,均偶欠仔细了。

其四,邹文否定“引河”说,同时肯定“引漳”说。邹文指出,邺地“受漂溺的只能是漳水”,大河水“绝不能泛滥到地势较高的临漳、安阳一线。所以笔者认为,如果承认西门豹有过引渠溉田的事实,则只能引漳水,不可能引河水”。话说得很决绝。然而《续安阳县志》所载,在今安阳旧城之东、东北(今安阳、临漳境内),20至40华里间,地下深处所发现之实物,足可说明,大河不仅可以泛滥到这一带,而且在禹河前,大河某次故道可能经过这一带(旧城东南30华里左右也有,乃在续县志印行后所发现)。方志之文过长,且易找到,兹不引。邹文肯定“引漳”之内容不多,对拙文否定“引漳”说所提之依据(三点可疑处),未置一语。敝意以为邹文肯定“引漳”说,既是对拙文提出不同意见,则对拙文中三点可疑处,似不必回避。当然,邹文肯定“引漳”,有其条件,即“如果承认西门豹有过引渠溉田的事实”。

其五,邹文不同意拙文肯定“引河”说,否定“引漳”说,而提出“只有按事物的情理来推论,看哪一种说法比较可能”。统观邹文,考辨西门渠部分,确实有不少推论,又屡用“可能”之类两可之语。笔者对“可能”云云之推论,连同其他一些目前可以缓论之处,待有必要时再作回答。邹文云:

如果从《吕氏春秋》说,西门豹没引过漳水,那末也就等于认为西门豹也不可能引河水。因为从《吕氏春秋》,就是同意史起说“魏氏之行田也,以百亩,邺独二百亩,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,而西门弗知用,是其愚也”。就是说,西门豹不知引水来灌溉,使恶田变为良田。如果西门豹引过河水的话,史起就不会这样说了。因此,认为西门豹引的是河水,就

等于否定《吕氏春秋》的说法。这样,就剩下引漳、引河的问题了。

这节推论之逻辑,颇有可议之处。邹文先将史起语中之“漳水”,引申为包括河水之“水”,然后以此引申为基础,推论说:“认为西门豹引的是河水,就等于否定《吕氏春秋》的说法”,从而得出“这样就剩下引漳、引河的问题了”之结论。——这节推论的前提,是对史起语作的引申,其结论能站住脚么?邹文不赞成转弯抹角之考证。不过,如果真正去做转弯抹角之考证,也必有考有证,也不能仅仅用几句建立在引申基础上的推论,代替考证,从而去否定最早之记载(《吕氏春秋》),与重要史籍(《汉书》)之承袭。所以这节推论,否定不了“不知引漳”说。

最后,拙文《西门渠引用何水》与《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城处》发出后多年,未见有赐教者。自知所述,不足以动大雅。今逸麟同志对拙文中某些地方,坦率地予以教正,感到荣幸。现在,虽遵嘱写出不同意见,作为回答,但自知学浅识卑,包括所讨论的两篇拙文,都未必妥当,请逸麟同志与有同好之其他同志多多指正。这篇回答,如有对邹文理解不够,从而误说,甚至歪曲原意之处,请指正,并多多批评。如有哪位同好找不到两篇拙文,请赐函,笔者愿复印寄上,以广征教益。笔者未订有学术报刊,如有同好赐教,也恳请惠赐一份,以便学习。候教处:河南安阳市丁家巷三号,邮编455000。

第一部分除全文引言外,为“西门渠引用何水”,原单独成文,于1983年提交河南省考古学会,后,发于内部刊物《安阳史志通讯》1985年3期,收入《邺下古渠考》时,有增删,观点与主要论据未变。邹文及本文中提到之西门渠文字,均为增删之后者。